

第三编
学术、科技与文艺



第十一章 管子学

第一节 管仲与管仲学派

管仲相齐 40 年，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不仅把齐国建成了一个经济发达、实力雄厚的强国，而且领导中原各诸侯国取得了抗击夷狄等少数民族入侵的胜利。管仲对齐国的富强和中原地区的和平安定、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其辉煌业绩是几千年来世所公认的。根据史料的记载，管仲在相齐的社会实践过程中，曾经对齐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诸多领域进行过变革。

管仲相齐期间，齐国在经济上采取过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如划定“四民分业”的产业格局；实行“均地分力”的土地制度；推行“相地而衰征”的赋税政策；对国家重要物资进行控制，即“官山海”；另外还鼓励发展工、商业等。政治上则实行“国鄙分野”，即“三其国而伍其鄙”；变革任官制度，如“三选法”，为国家选取了大批贤能之士。在军事上通过“作内政而寓军令”，使齐国的军事实力大增。在外交方面，实行“善邻”政策，并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这对于中原地区的安定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管仲的这些改革措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不仅造福于当时，而且泽被后世。因此，管仲生前受人拥戴，死后亦受到歌颂，孔子曾赞颂管仲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①司马迁在《史记》中亦盛赞管仲。梁启超则用“国史上第一流人物”，“中国最大之政治家，而亦学术思想界一钜子也”，“中国历史上开一新生面耶”等语来评价管仲。足见管仲的思想和业绩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① 《论语·宪问》

管仲学派是以发挥和发展管仲的治国理论为主旨的重要学术流派。它由管仲奠基,主要由齐国的推崇管仲的学者构成,他们追述管仲的言行,继承并且根据时代的变革不断丰富和发展了管仲的思想。管仲学派是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齐学的形成和发展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从春秋至秦汉,崇奉管仲的学者们,前后相传,积累成书。铸成了管仲学派的代表之作——《管子》。

关于管仲学派,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为人们所忽视,甚至有人否认它的存在。我们认为,历史上不但存在一个独立的管仲学派,而且这个学派的影响也是巨大而深远的。

据今人研究,管仲学派有一个世代沿袭、师承传授的历史传统。古代各学派的传授方式是:“父传之子,师传之弟,则谓之家法,六艺诸子皆同。”“周秦两汉之书,其先多口耳相传,至后世始著书帛。……故有名为某家之学,而其书并非某人自著者。”^①这主要是指私学出现之后学派传授的特点。管仲所处的时代是“学在官府”,但官学也有一套世代相沿的传授方式,《荀子·荣辱》说:“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持(侍)王公,是故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可见,当时学习和传授官学的是“官人百吏”,他们学习和传授官学是为了“持王公”、“取禄秩”。管仲作为齐相,其学说自然被齐国的“官人百吏”所学习、传授和贯彻,并且进一步发挥和发展。这种学习、传授、发展的结果便是《管子》的问世。对此,《淮南子·要略》曾指出:“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清代学者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中也指出:“春秋之时,管仲尝有书矣,然载一时之典章政教,则犹周公之有官礼也。记管仲之言行,则习管氏法者所缀辑,而非管仲所著述也。”由于管仲功业显赫,“立言”精辟,他的崇拜者

^① 《四库提要辨证》卷十一,子部二

和信徒们便把他的言行加以搜集、整理。而这些人应算是管仲学派的最早成员。

春秋中后期，管仲的事迹和学说继续被管仲学派迭相传授，《管子》中的许多篇章即是形成于这一时期。在当时，管仲的思想言行被广为传颂，如春秋末期的齐景公便经常以恢复桓公霸业自诩；他要求晏婴也能“继管子之业”，“遂武功而立文德”，而晏婴则一一列举桓管业绩，力谏景公。^①管仲的学说不仅被齐国君臣上下所传颂，而且也在其他诸侯国广泛流传。楚国的老子在《道德经》中关于天道自然、人法天地、欲取先予、祸福转化等观点，皆可在《管子》“经言”各篇中找到思想雏型，有些语句也基本相同，可见老子是受到《管子》书的影响的。鲁国的孔子对管仲的言行业绩非常熟悉，他曾多次评论管仲，其所涉及的资料，可在《管子》中找到根据。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管仲学派所整理、辑录的管仲的思想学说在当时是广泛流传于社会的。

战国时期，管仲学派及其思想学说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稷下学宫建立以后，更是为各学派的争鸣、融合和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管仲学派也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一契机，使自己的思想学说进一步发扬光大。当时齐国人以有管仲、晏婴而自豪，几乎言必称管晏。孟子游齐时，他的学生公孙丑问他：“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回答说：“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②其实，身居齐国的孟子，亦常以管仲为课题，甚至把管仲与传说中的先君圣贤相并称；孟子的有些思想，特别是经济思想和民本思想，同《管子》是一致的。甚至有些语句如“省刑罚、薄赋敛”等也大体相同。清代学者毛大可认为这是孟子抄袭《管子》。这至少可以说明《管子》思想对孟子的影响。^③ 稷下学宫中颇有影响的鲁

① 见《晏子春秋》

② 《孟子·公孙丑上》

③ 参见王德敏、刘斌等著：《管子十日谈》，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

仲连,在致聊城燕将的书中,发挥管仲“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的价值观,劝说燕将要以为管仲的思想和功业为榜样,而不要执迷不悟地死守孤城。从这些历史事实,我们可以窥见管仲学派在继续活动并不断发展的踪迹。对于管仲学派及其影响,《韩非子·五蠹》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这说明,管仲学派的思想学说在时代的发展面前积极地创造、发展,以符合新的时代要求,这样才能被人们广泛接受。从《管子》许多篇章带有这一时期的时代烙印来看,也可证明这一点。据现代学者研究,管仲学派在战国中、后期得到了充分发展,它是稷下学宫中的核心力量。^①

秦汉时期,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的统一,各学术流派、各思想学说趋于整合已成大势所趋,但在传统文化还未完全整合之前,各学派仍在积极活动,发展自己的思想学说,这便导致了汉初诸子之学的复兴。在这一时期,管仲学派也不断发挥其思想学说,以为统治者所赏识。管仲学派的经济思想主要是在这一时期形成和完善的,管仲学派的后继者们,打着发挥管仲“轻重”理论的旗号,实则总结当时经济政策中的经验教训,从而为巩固社会统治服务。从《盐铁论》记载的汉昭帝时围绕盐铁经营的争论和御史大夫桑弘羊对管仲学说的继承发展可以看出,管仲学派的“轻重”理论对当时汉王朝所推行的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管仲学派的代表们同其他学派一样,也不断变革自己的思想学说,以新的形式、新的形态继续向前发展。对此,宋代学者叶适说:《管子》“其时固有师传,而汉初学者讲习尤著,贾谊、晁错以为经本”。^②

从以上可以看出,管仲学派确曾存在一个连绵不断的师承传

^① 参见王德敏、刘斌等著:《管子十日谈》,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5—26页。

^② 叶适《管子文评》。

授系统,但由于复杂的原因,为数众多的学派成员已经佚名。不过,管仲学派的众学者们世代相传、累积成籍的成果却流传下来了。这些佚名学者相继完成的集体成果就是被誉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的历史巨著——《管子》。

第二节 《管子》的相关问题

一 《管子》的成书年代

对于《管子》一书的成书年代,自古至今,众说纷纭,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管子》成书于春秋说。这一说法的主要代表是韩非、司马迁、刘向、班固等,他们认为《管子》是管仲的遗著,其成书年代自然是在春秋时期了。

2.《管子》成书于战国说。明代学者朱长春首先在其《管子榷》中提出这一观点;以后黄云眉在《古今伪书考补正》中亦主张此说;今人亦有此说。^①

3.《管子》成书于汉代。持这一说法的主要是现代的一些学者。^②

4.《管子》成书于春秋至秦汉。这一说法主要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现代学者牛力达、刘蔚华等亦主此说。

对于《管子》的成书年代,我们应从其内容上加以分析。据今人研究:《管子》的“经言”和“外言”的“五辅”篇,属于春秋时代的作品;而“立政”、“七法”、“版法”、“幼官”、“八观”、“法禁”、“重令”、“兵法”、“法法”等则明显带有战国时代的特征;“弟子职”则反映了稷下学宫中的一些特色;“轻重”诸篇则带有秦汉时代的印迹。所以,《管子》“非一人所著,亦非一时之作”已成为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我们认为,《管子》既然是管仲学派集体智慧的结晶,其内容

^① 《〈管子〉的时代和思想》,《北京大学学报》1975年第4期。

^② 参见王德敏、刘斌等著:《管子十日谈》,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亦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其中有些内容在春秋时代就已形成，这可以说《管子》的最早“版本”。战国时代，管仲学派的代表者们对《管子》的内容加以丰富和发展，又加进了许多篇章。《韩非子·五蠹》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由此可见，《管子》在战国时代已广为流传。至秦汉时代，《管子》继续广泛传播，这一时期管仲学派的代表人物又将《管子》的内容进一步拓展，以至到刘向编定《管子》时，其内容已达 564 篇。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管子》，是以刘向编定的“版本”为基础，又经历代学者校订而成的，其中已有许多篇章佚失了。尽管如此，《管子》仍不愧为是我国古代的重要典籍，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学术著作。

二 《管子》的思想体系

《管子》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或基本统一的思想体系？对此，历代学者众说不一，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

第一，否定论。即认为《管子》杂凑诸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完整的思想体系。如朱熹、叶适、黄震、蒋伯潜、郭沫若等认为《管子》是“杂凑”；陈沆、梁启超认为《管子》是“类书”；顾颉刚则说《管子》为“丛书”；冯友兰则认为《管子》是稷下学宫的“学报”。

第二，基本肯定论。即认为《管子》虽杂，但却有一种基本倾向或主导思想，或其主要部分自成体系。坚持这一主张的主要有现代学者冯契、张岱年等。

第三，肯定论。即认为《管子》整部书有一个比较完整、统一的思想体系。坚持此说的主要有现代学者王献唐、陈逸光等。

我们认为，《管子》内容虽杂，但其中确存在一个比较一致的思想体系，这体现在《管子》书中，不论论述哪方面的问题，无一不是在探求事物的发展规律——“道”。正是这一主旨，使管仲学派的思想体现出务实、尚变的特色，这与自然、社会的变化发展是一致的。《管子》对“道”的认识，有以下几点。

第一，“道”是无形、无声的，宇宙万物都是由“道”而生的。“冥冥乎不见其形，淫淫乎与我俱生。不见其形，不闻其声，其序而成，谓之道”。^①“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败，所得以成也。民道无根无茎，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②道虽然是眼看不见，耳听不到，口不能言，但却是万物得以生成的根据。

第二，道具有普遍性，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普遍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夫道者，所以充形也。”^③“道满天下，普在民所。”^④

第三，道是“至大”与“至小”的统一。“道在天地之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⑤道充塞天地，构成万物，“遍流万物而不变”，所以是“其大无外。”同时，“道”又是“虚[而]无形”。^⑥“万物皆得以然，莫知其极”^⑦所以，又是“其小无内。”

第四，“道”还具有客观规律的意义。如“天之道”就是“虚无形”、“周而复始”；“地之道”就是“以静为宗”^⑧。天地各有自己运行的常法、规律。

第五，人通过修心静意、心静气理便可以得“道”。“凡道无所，善心安爱。心静气理，道乃可止。彼道不远，民得以产；彼道不离，民固以知。是故卒乎其如可与索，眇眇乎其如穷无所。彼道之情，恶音与声，修心静意，道乃可得。”^⑨“德者，得也，得也者，谓其所得以然也”。^⑩人通过虚心、静意便可使道驻于心间，从而使自己的言行符合自然之“道”。

所以，《管子》在诸多方面都意在揭示事物自身的固有规律。不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不论是事物自身，还是人对事物的认

①②③④ 《管子·内业》
⑤⑥⑦⑧《管子·心术上》
⑨ 《管子·自心》
⑩ 《管子·内心》。

识过程；不论是社会发展的政治方面，还是社会发展的经济方面，乃至社会的军事、伦理等诸多方面，都有其内在的规律性。《管子》一书正是把探求这些客观规律作为自己的最终目的。

除《管子》的作者、时代、内容等方面的争论外，对《管子》的篇目、版本，历代也存在不同的看法。

三 《管子》版本述略

西汉刘向编订《管子》前，管子书就广为流传，据刘向的《管子叙录》记载，他校订《管子》时，所依据的管子书，有中管子书 389 篇，太中大夫卜圭书 27 篇，富参书 41 篇，射声校尉立书 11 篇，太史书 96 篇，总计 564 篇，删去重复 484 篇；最后定著 86 篇。《韩非子·五蠹》篇云：“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汉末，诸葛亮读书隆中，“自比管、乐”。六朝时期，士多以功利为耻，五霸为羞，《管子》一书隐而不显，任其简析文讹，残缺凌乱，未有加以整理注解者，所以至唐初时，已很难找到一个完整的本子了，后经房玄龄、尹知章等整理注释，方复显于世。今能看到的古写本，为唐昭宗天复二年（902 年）抄写的《法禁》、《兵法》中的二则文字（敦煌残卷）及敦煌残卷《修文殿御览》引《管子·霸形》篇文。^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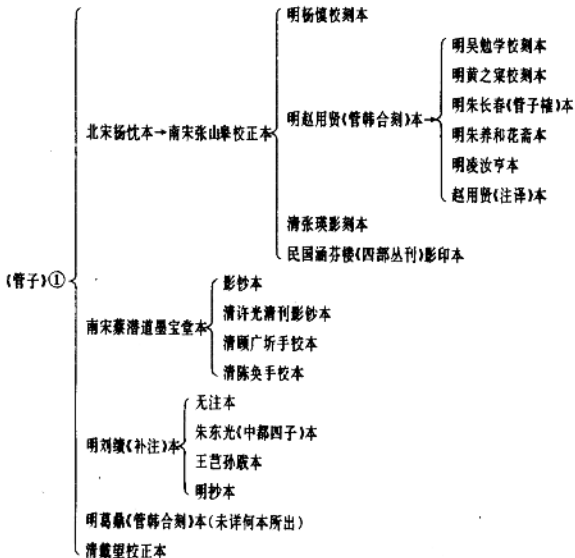
今能见到的《管子》最早刻本为宋代杨忱本。流传至今的宋刻本，除杨忱本外，还有张嶧校正本（载有杨忱《序》）和蔡潜道墨宝堂本。三本皆署房玄龄《注》。杨忱本刻于北宋，张本、蔡本皆刻于南宋绍兴年间，以后的本子几乎皆由二者所出，特别是张本。

宋本《管子》历经翻刻流传，至明朝初年，已残缺不全，“故有杨忱序，惜今亡传，且无篇第”。^②于是杨慎特作校刊，凡为卷二十四，篇分《经言》、《外言》、《内言》、《短语》、《区言》、《杂篇》、《解》、《轻重》，以还其旧。然杨本意在篇第，未及文字内容，所以后来赵用贤本一出，杨慎本即被淹没。

^① 《鸣沙石室佚书》。

^② 杨慎：《管子叙录》。

赵用贤本,即《管韩合刻》本,始刊于明朝万历十年,赵本出于杨忱本,是明刻中最完善,也是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一种本子,其后诸刻无不脱胎于此。明清两代,《管子》版本可谓繁多,并各成系统,今列表说明如下:



四 《管子》研究概况

《管子》在战国至秦汉时期相当流行,韩非子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宋人叶适也说:“汉初学者讲习尤著,贾谊、晁错以为经本,故司马迁读管氏书曰,详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为整比,乃汉世行书,至成、哀间,向、歆父子论定群籍,古文大盛,学者虽疑信未明,而管氏、申、韩由此稍绌。”② 随着汉代

① 此表见周洪才:《管子》版本考述,载《管子学刊》1990年第2期。

② 叶适:《习学纪言》。

儒学成为正宗，齐学渐趋式微，对《管子》的习学，研究也趋于冷落，所以直到唐代之前却未见有人为之作注，“自其事盖称于圣门，而其言悉见绌，以为权谋功利，学者鲜能道之”。^①于是出现了六朝时期《管子》研究(包括注释、考证等)的空白。

唐代社会安定，文化发达，注疏旧籍，蔚然成风。《管子》这部先秦宝典也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唐代研究《管子》的主要著作有：魏征《管子治要》一卷，其书节录《牧民》、《轻重》等篇重要文字，以为理政参考，后收入《群书治要》。马总《管子要语》(在《意林》内)，杜佑有《管子指略》二卷(《崇文总目》作《管氏指略》)，其书皆采录原书个别章句，不加注释，还缺乏研究。唐代对《管子》研究做出重大贡献者，要算房玄龄和尹知章了。二人为《管子》作注，尹《注》，《唐志》作十九卷，《通志》谓：“旧有三十卷”；房《注》，《通志》著录二十四卷，今见到的宋版明刻也均为二十四卷。其注释工作有筚路蓝缕之功，然多有抵牾，所以《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文浅陋，颇不足采”。但这并不意味着注文本身没有文献价值。正是由于房、尹二人的整理注释，方能使《管子》一书复显于世。

宋元时期可谓《管子》研究的复兴时期。这时，《管子》一书业已付梓雕印，雕印之前刻校者不仅需要对所搜集的古本进行反复校正，而且往往最后还附上一篇有关文字，称作“序”或“跋”，这是一种颇有价值的整理研究成果。流传至今的张山肇校本中的杨忱《序》、张山肇的《读管子》，正是这种文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山肇的《读管子》，其文虽不足四百字，然“读者累月，始颇窥其义训。然舛脱甚众，其所未鲜尚十二三。用上下文义及参以经史刑政，颇为改正其讹谬。疑者表而出之，其所未鲜者置之，不敢以意穿凿也。”^②另外，宋代还有丁度的《管子要略》，元代有牟楷的《管仲子纠辨》，可惜今皆不传。其他对《管子》的研究还夹杂在学者的笔记

^① 赵用贤：《管子序》。

^② 张山肇：《读管子》。

杂著中，如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叶适《习学纪言》、黄震《日钞》、王应麟《因学纪闻》中，皆有精辟之论。

明清二代可谓古代社会中《管子》研究的昌盛期。明代《管子》方面的著述繁富。单行著作，合刻本，还有书内有关篇章，各种形式应有尽有。在各类形式的著述中，学术价值较高、参考价值较大的要算注释、考订著作了。明代这类著作主要有：刘绩《管子补注》二十四卷，张登云《管子参补》二十四卷，朱长春《管子榷》二十四卷，张榜、朱长春《管子评注》二十四卷，梅士享《论叙管子成书》十五卷。凌汝亨《评注管子》，朱养和《管子批评》二十四卷。其中以刘绩《补注》最为重要，其注“于旧解颇有匡正，皆附于原注之后，以‘绩按’别之。虽其循文诠释，于训诂亦罕所考订，而推求意义，务求明惬，较原注所得则已多矣”。^① 明代其他类型的节选、排纂等，往往对原著任意删节移易，他们嗜好此书“大抵重视其文藻，不脱高头讲章式之恶习。”^② 这类著作虽种类繁多，但价值不大。

清人偏重校释，在研究《管子》方面成就突出，其主要著作有：洪颐煊的《管子义证》、王念孙、王引之的《管子杂志》、宋翔凤的《管子识误》、俞樾的《管子平议》、张文虎的《管子校正》、许玉琢的《读管子》、戴望的《管子校正》、王绍兰的《管子说》、丁士函的《管子注》、吴汝纶的《管子点勘》、何如璋的《管子析疑》、张佩伦《管子学》、陶鸿庆的《读管子札记》、江瀚的《管子识小》、宋柟的《读管子寄言》等。清代诸家中，以王念孙、王引之的《管子杂志》最为精审。

清人承明人余绪，仍有节选评点式的作品不断出现，其主要著作有：刘光蕡的《管子·小匡》节评、马国翰的《内业》节评、任兆麟的《弟子职》评、庄述祖的《弟子职》集解、王筠的《弟子职》正音、孙国己的《弟子职》注、桂文燦的《弟子职》解诂等。这些注释和评语，相当于现在的选注，也属别一体裁的著作。其中也有许多有价值的成

^① 《四库全书总目》。

^② 《管子集校·叙录》。

分。

民国时期，由清而来的学者继承了清代那种扎实求足的学风，在前人对《管子》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前进。他们有的不满旧解，重新作注，如尹桐阳的《管子新释》、支伟成的《管子通释》、陈准的《管子集注》、庞树典的《管子补注疏义》；有的另辟新径，如于省吾证以卜辞金文，作《管子新证》四卷；有的则企图荟萃各家、集其大成，如范耕研著《管子集证》二十六卷；还有的就《管子》各篇真伪及作者问题详加考辨，如罗根泽的《管子探源》，刘咸忻的《管子书疏》，张心澄的《管子考》；更有人认为《管子》原书篇章结构不尽合理，应重新改编，如石一参的《管子今注》，黄巩的《管子编注》，一名的《管子新编》。另外，这个时期还有不少学者校书读书的笔记，如章炳麟的《管子余义》、姚永概的《管子笔记》、邵瑞彭的《管子隐义》、梁启超的《管子传》、刘师培的《管子斟补》、金廷桂的《管子参解》、李哲明的《管子校义》、庞树典的《管子补注疏义》、颜昌峣的《管子校释》、《校管异义》、金其源的《管子管见》等。这个时期同明清一样，仍有一些选注本出现，如宋育仁的《弟子职说例》、杨钟义的《弟子职音谊》等。

新中国成立后，对《管子》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出版的研究《管子》的专著主要有：郭沫若的《管子集校》、赵守正的《管子通解》、《管子注译》、胡家聪的《管子新探》等。有的学者则就其中的某些篇章作专门的研究，代表著作有：马非百的《管子轻重篇新论》、巫宝三的《管子经济思想研究》等。另外，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公开发表的研究《管子》的论文，截止1997年，已达500余篇。1987年，淄博组织创办了《管子学刊》，它以“研究管子、开掘齐学、去粕存精、古为今用”为宗旨，成为研究、弘扬《管子》思想的重要阵地。

第三节 管子学的基本内容

一 “水”本原论

管子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水”是万物本原的思想，“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①并进一步对这一思想进行了详尽的论证。

首先，水无所不在，万物皆得水以生。《水地》篇说：“（水）无不满无不居也，集于天地，而藏于万物，产于金石，集于诸生。”水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从无机物到有机物再到动物直至人，都是由水而生。无机物如玉石之类，是由水构成，“水集于玉，而九德出焉”^②玉石所具有的温润而光滑、文理鲜明、坚而不硬、洁而不污、宁折不弯、疵瑕皆见、茂华光泽等，都是水集于玉的结果。有机的草木之类，也是由水而生；“集于草木，根得其度，华得其数，实得其量。”^③草木的根、花、实皆赖水而生。有生命的动物之类，也是水的产物；“鸟兽得之，形体肥大，羽毛丰茂，文理明著。”^④鸟兽有了水，才能生长良好。至于人类，也是由水构成的；“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行，”^⑤人的五脏、九窍、五虑都是由水而成“凝蹇而为人，而九窍五虑出焉，”^⑥把人的眼、口、鼻、耳等生理器官和视、听、嗅、言、思等思维能力都看作水集而成。由以上得出结论：“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万物莫不以生。”^⑦

《管子》中万物皆由水构成的思想，充分表现了其唯物主义一元论。

其次，水具许多特性，可以和人的道德品性相比附。管子学认为：水很清静，有洗垢去污的作用，这是水的“仁”性；水看似很黑，实则很白，这是水的“精”性；量水，它至满而止，这是它的“正”性；水方圆斜曲，无所不流，至平则止，这是水的“义”性；水往低流，这

①②③④⑤⑥⑦ 《管子·水地》。

是它的“谦卑”之性。

水不仅具有许多特性，而且还是衡量万物的标准，“准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质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是以水者万物之准也，诸生之淡也，违非得失之质也。”^①

《管子》以人的道德品性比附水的自然属性，目的是强调水在万物中的重要地位，也是论证水为万物本原的一个论据。

最后，水对社会风俗习惯和人的性格的形成具有决定作用。《管子》认为，各国人的性格不同和各地风俗习惯的差异，都是由于水性不同所致。“夫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晋之水，枯旱而运，淤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滞而杂，故其民愚戇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简易而好正。”^②因此，圣人治国，重视水质的改变，“是以圣人之化世也；其行在水，故水一而民心正，水清则民心易；一则欲不污，民心易则行无邪，是以圣人之治于世也，不人告也，不户说也，其枢在水。”^③

《管子·水地》把水列为世界的本原，从无机物、有机物、动物、人类直到神灵，它们的产生与成长，都由水来决定；就是人类社会中的风俗习惯、性情特征、道德品质等也是由水来决定的。总之，在《管子》看来，水是万物的本原，生物的祖宗，是“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④

二 “精气”说

《管子》中的“气”论是先秦气论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管子》中对气作了系统的论述：

首先，对阴阳之气的本体论意义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论证。《管子·内业》说：“包物众者莫大于天地，化物多者莫多于日月。”尹知章注曰：“万物共在天地之中，……日，阳也；月，阴也。物皆禀

^{①②③④} 《管子·水地》。

阴阳之气然之也。”认为阴阳的化合产生万物。“是故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①

其次，用阴阳之气的发布流行去规定春夏秋冬四时的性质。“五政苟时，春雨乃来，南方曰日，其时曰夏，其气曰阳，阳生火与气。……其时曰秋，其气曰阴，阴生金与甲。……北方曰月，其时曰冬，其气曰寒，寒生水与血。……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其德喜羸，而发出时节。”^②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不同特点都是由阴阳之气的变化所决定。

再次，提出“精气”概念，并对它作了多方面的规定。《管子》中出现了各种气的概念，并试图以此说明各种自然和社会现象。但在说明的过程中，由于理论本身的局限，所以对许多现象难以作出合理的完满的解释。因此，《管子》从各种气中抽象出了“精气”的概念。

何谓精气？《管子·内业》说：“精也者，气之精者也。”精气是气中最精微者。“凡物之精，比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此气，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乎海，卒乎如在于己。是故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意。”^③ 此段论述有以下几层含义：第一，精气具有普遍性，它无处、无时不在；登天、入渊、在海、在己，超越时空，恒久不灭。第二，精气具有变化性，它固流于万物，在不同的物质形态那里具有不同的特性。第三，精气产生天地万物，五谷、星辰、鬼神、人类以及人类的精神，心智都是精气所产生的。

《管子》精气说的提出，是力图穷尽物质世界深微处的一种反映，它在说明世界物质的多样性和统一性方面，比用一种或几种有形的、特殊的東西去说明万千事物的本原前进了一大步。“精气”说

^{①②} 《管子·四时》。

^③ 《管子·内业》。